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

〔德国〕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周国平 译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

德国「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周国平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 / (德) 尼采 (Nietzsche, F.)
著; 周国平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2
(青年尼采作品)
ISBN 978-7-5447-4080-7

I. ①论… II. ①尼… ②周… III. ①尼采, F.W. (1844~
1900) — 教育思想 IV. ①G40-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50274号

书 名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
作 者 [德国] 弗里德里希·尼采
译 者 周国平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江 汀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98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080-7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说明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是尼采的一部早期著作，写于1872年，未完成，生前未出版。译者于1996年译出，现在做校订后付梓出版。原著各讲只有序号，标题和内容提要均为译者所加，以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原著的脉络。“译者导言”是译者对原著基本思想的阐释，供读者参考。

译者导言
教育何为？

一、关于《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是尼采的一部未完成著作，生前没有出版。原标题下有一个副题“六篇公开演讲”，实际上只写了五篇，1872年1月至3月，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做了这五次公开演讲。在做演讲期间，他在一封信中表示对演讲的效果特别满意，大学生们听得非常认真专注，他并宣布“这将是我的第二本书”，可见原来是有出版的想法的。^①当时正值他和瓦格纳夫妇的友谊的蜜月期，瓦格纳携夫人柯西玛到巴塞尔听了第二篇演讲，他在1872年底把五篇演讲稿寄给了柯西玛，而瓦格纳曾两次建议他发表此著。但是，不知何因，他不但没有续写计划中的第六篇，而且以自己对此著很不满

^① 转引自 *Friedrich Nietzsche: Chronik in Bildern und Texten*.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Wien 2000 (《尼采传记图文版》，Carl Hanser 出版社，慕尼黑—维也纳 2000 年)，第 263 页。

意为由拒绝了发表的建议。

和尼采的大多数著作不同，这本书是有情境设计的，尼采似乎产生了文学的冲动，在演讲中营造一种讲故事的气氛。故事里有四个人物，两个年轻的另类大学生为一方，一位年老的哲学家和他的弟子——一位年轻教师——为另一方。在一个美丽的黄昏，双方在莱茵河畔一处林中空地相遇，由误会、冲突而至互相理解和畅谈，谈话的内容则围绕着教育，分别从学生、教师和哲学家的立场对德国教育现状进行了批判。其中，那位哲学家是主角，其性格阴郁、暴躁、正直，据说是按照叔本华的原型描绘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从表达的见解来看，每个人物其实都是尼采自己的替身，而不同的替身则使他能够方便地表达他以前当学生、现在当教师的相应感受，以及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对于教育的思考。

在写作本书的那个时期，尼采关心的主题是希腊文化。此前一年，他刚出版了谈希腊艺术的《悲剧的诞生》，此后一年，他又写了谈希腊哲学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本书虽然没有直接谈希腊教育，但是，希腊文化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教育的典范和故乡，构成了他的教育思考和教育批判的理性出发点。德国现代教育机构奠基于启蒙时代，在尼采看来，它们本来是启蒙思想家所代表的“真正的德国精神”的产儿，而“这个精神通过最高贵的需要与古希腊紧密相连”。然而，现在这些机构却是唯“时髦”和“合乎时势”是求，“歪曲和

偏离了创办时的高贵初衷”。因此，希望在于振兴从古希腊到德国启蒙运动的精神传统，“把现代人从‘现代’这个咒语下解救出来”，如此才“使得这些机构也能相应地从之新生”。^①

尼采面对的主要听众是大学生，这无疑使他格外强烈地回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 24 岁被聘为巴塞尔大学教授，做这一组演讲时也才 27 岁，距学生时代不远，印象还很鲜明，满可以现身说法。无论是以前作为学生，还是现在作为年轻教师，他对大学生们在“现代”这个咒语下的境况都有真切的了解，他描述为“处在这个时代的永不停歇的骚动之中”，仿佛被切割成了碎片，不再能领略那种“永恒的愉悦”。^②

当然，面对时代的骚动，青年学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尼采自己就是这样。在中学时代，他即已自觉地抵制以谋求职业和服从国家利益为目标的教育体制，和少数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以自我教育为宗旨的小团体。他告诉他的听众：“当时我们压根儿不去想所谓职业的问题。国家要尽快为自己培养出合用的公务员，通过负担过重的考试保证他们的绝对顺从，为此频繁地剥削中学生的年华，而这一切被我们的自我

^①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导言，本书第 3 页；第四讲，本书第 66 页。（本书译自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München 1999. Bol.1.《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G. 科利、M. 蒙梯纳里编，德国袖珍图书出版社，慕尼黑 1999 年，第 1 卷。）

^②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一讲，本书第 15 页。

教育拒于千里之外；任何功利的考虑，任何飞黄腾达的意图，都不能支配我们。”他感到无比自豪的是，正因为摒弃了功利的考虑，在“这个厌弃一切无用之事的时代”，他们却能“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自得其乐”，“优哉游哉地逍遥度日”，“做惬意活在当下的无用之人”。^①在本书中，他在学生时代的自我教育的经验构成了他的教育思考和教育批判的感性出发点。

要澄清教育的理念，对教育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前提是超越时代的浮躁。虽然多数学生已经陷在时代的骚动中不思自拔或不能自拔了，然而，尼采相信，一定还存在着少数人，他们像他一样“被一种相同的感受所震荡”，他要用这本书来寻找这些散落在各处的他的同类。他宣布：这本书是为“安静的读者”写的，也就是为那少数人，他们“尚未被卷进我们这个飞速转动的时代的令人眩晕的匆忙之中，尚未被它的轮子碾碎并因此感到一种为偶像献身的满足”。^②

在后来的著作中，尼采也有不少涉及教育的言论，但这部青年之作是他唯一的一部谈教育的专著，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本书的特点是，既饱含着一个亲历者的新鲜感受，又贯穿着一个哲学家的成熟思考，我们会发现，即使针对今日中国的教育，我们仍能产生同感并得到启发。

①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一讲，本书第 27 页。

②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前言，本书第 10 页。

二、教育中的两种错误倾向

在导言中，尼采开宗明义指出：“在现代，有两股貌似相反、就其作用而言同样有害、就其结果而言终于汇合的潮流，统治着我们原本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的教育机构：一方面是尽量扩展教育的冲动，另一方面是缩小和减弱教育的冲动。按照前一种冲动，教育应当被置于越来越大的范围中，另一种倾向的人则要求教育放弃它的最高的骄傲使命，而纳入为另一种生活形式即国家生活形式服务的轨道。”^①

在第一讲中，尼采再次强调：“我认为，我必须区分两种主要倾向——两种支配着我们教育机构现状的潮流，它们表面上相反，但都具腐蚀作用，从它们的结果看终于合流：第一种是尽量扩大和普及教育的冲动，第二种是缩小和削弱教育

^①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导言，本书第8页。

本身内涵的冲动。基于各种理由，应该把教育送往最广泛的阶层——这是第一种倾向的主张。相反，第二种倾向则要求教育放弃其最崇高最高贵的使命，屈尊为其他某种生活形态服务，例如为国家服务。”^①

在全书中，尼采对德国教育机构现状的批判正是围绕着上述两种倾向进行的。其实，这两种倾向是一回事，在外延上扩大教育，就必定在内涵上缩小教育，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后者是前者的实质。不过，在具体论述时，尼采有所侧重。关于扩大教育的倾向，主要谈教育的普及化，使教育沦为谋生的手段。关于缩小教育的倾向，主要谈教育的政治化和学术化，使教育沦为国家利益的工具和学术分工的工厂。

总之，现代教育违背了教育的本义，越来越被功利所支配，而这正是时代的浮躁侵入教育领域的恶果，也是大多数受教育者不得不陷入时代的浮躁的根源。

1. 扩大教育的倾向：教育沦为谋生的手段

对于扩大和普及教育的倾向，尼采是这样描述的：“普及教育是最受欢迎的现代国民经济教条之一。尽量多的知识和教育——导致尽量多的生产和消费——导致尽量多的幸福：

^①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一讲，本书第30页。

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响亮的公式。在这里,利益——更确切地说,收入,尽量多赚钱——成了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按照这一倾向,教育似乎被定义成了一种眼力,一个人凭借它可以‘出人头地’,可以识别一切容易赚到钱的捷径,可以掌握人际交往和国民间交往的一切手段……每一个人必须学会给自己精确估价,必须知道他可以向生活索取多少。按照这种观点,人们主张‘智识与财产结盟’,它完全被视为一个道德要求。在这里,任何一种教育,倘若会使人孤独,倘若其目标超越于金钱和收益,倘若耗时太多,便是可恨的……按照这里通行的道德观念,所要求的当然是相反的东西,即一种速成教育,以求能够快速成为一个挣钱的生物,以及一种所谓的深造教育,以求能够成为一个挣许多钱的生物。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仅限于赚钱的需要,而所要求于他的也只有这么多。简言之,人类具有对尘世幸福的必然要求——因此教育是必要的——但也仅仅因此。”^①

人为了谋生必须学习相关的技能,这本身无可否认也无可非议,尼采反对的是把它和教育混为一谈,用职业培训取代和排挤了本来意义上的教育。他再三强调:“你们不要混淆两类事情。为了生存,为了进行生存斗争,人必须多多学习;可是,他作为个体为这个目的所学所做的一切仍与教育毫不

^①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一讲,本书第30—31页。

相干。相反，唯有在一个超越于这个窘迫、必需、生存斗争世界的大气层里，教育才开始。”真正的教育是一个纤足的仙女，而这种以谋生为目标的所谓“教育”只是“一个可供使唤的丫鬟”，“一个有智识的女仆，生计、收益、需求方面的女管家”。“任何一种学校教育，只要在其历程的终点把一个职位或一种谋生方式树为前景，就绝不是真正的教育”，而只是一份指导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的“说明书”，相关的机构则是一些“对付生计的机构”，绝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他总结说：“从我这方面讲，我只知道一种真正的对立，教育机构与生计机构的对立”。^①

尼采并不反对生计机构，但要求严格区分教育机构与生计机构。德国学校长期实行双轨制，这种区分一向是有的。他心目中的教育机构，文科中学（Gymnasium）是典范，着重古典人文教育，学生毕业后可升入大学深造。相反，实科中学（Realschule）则是他所认为的生计机构，着重职业培训，学生没有大学入学资格。使他担忧和痛心的是，文科中学正在向实科中学看齐，二者的区别正在趋于消失。他痛苦地预言，不久以后，大学也会向实科中学的学生开放，“因为事实是，实科中学和文科中学在其现今目标上总体上是如此一致，只在细节上彼此有所不同，因此可以要求国家给予完全平等的

^①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四讲，本书第80、81、84页。

权利”，而他真正想得出的结论是：“由此可见，我们缺少学校教育机构的一个种类，即真正教育机构的种类！”^①他的预言在三十年后得到了应验，大学也向实科中学的毕业生开放了。

双轨制的取消也许是教育民主化进程的必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尼采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教育有无超出职业培训之上的更高使命？仅以职业培训为目标的教育还是不是真正的教育？在教育日趋功利化的今天，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2. 缩小教育的倾向之一：教育沦为学术分工的工厂

尼采把日益细化的学术分工视为缩小教育内涵的倾向的重要表现，对之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如今学术的范围已经扩展得如此之大，一个资质虽非超常但良好的人，倘若他想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就必须潜心于某一个专业领域，对其余领域只好不闻不问。如果他在他那个领域算得上是鹤立鸡群，在所有别的领域——这意味着在一切主要事情上——他却属于鸡群。所以，某一专业的一个精英学者很像工厂里这样一个工人，他终其一生无非是做一个特定的螺丝钉或手柄，隶属于一种特定的工具或一台机器，在这一点上他当然能练

^①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四讲，本书第83页。

就令人难以置信的精湛技艺。”“……在今天，一个人为了学术的利益而被榨取，这是到处都没有异议地接受的前提，还有谁问自己，一种如此吸血鬼似地使用其造物的学术究竟能有什么价值？”教育本应使受教育者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而学术分工只是培养出了片面的人，尼采据此断言，其实际上在追求的目标正是“缩小教育，甚至是毁灭教育”。^①

在过去若干世纪里，在人们的概念中，学者就是有教养的人，现在这种名副其实的学者的产生越来越偶然，甚至越来越不可能了。这两个身份发生了背离，“……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有时会在同一个人身上相遇，但绝不会彼此重合”。^②二者都可称博学，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博学。过去的学者有自己的真兴趣，“能够出于他的爱好阅读他的柏拉图，他的塔西佗”，其博学“仿佛是一种指向最高贵目标的教育的自然而然、不求而得的副产品”。现在的学者却是“一些小家子气的梵文学者、语源学癖、考证狂”，其博学“可以譬作一个不健康的躯体的过度发胖”。前一种博学实即真正的人文素养，曾是文科中学古典人文教育的自然产物，而现在，由于“学术预备教育”被树为文科教育的目标，文科中学就成了培养后面这种“博学肥胖症”的场所。^③

①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一讲，本书第33—34页。

②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一讲，本书第47页。

③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三讲，本书第71页。

3. 缩小教育的倾向之二：教育沦为国家利益的工具

缩小教育内涵的倾向的另一个表现是国家对于教育的控制及其强化。尼采指出：“普鲁士是最强大的现代国家，正是它如此严格地执掌着教育和学校的最高领导权。”^①事实确是如此。在欧洲，德国是率先把学校的管理权从教会转到政府手中的国家，这个过程到19世纪初已基本完成。普鲁士和其他各邦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掌控各级学校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在基础教育阶段，国家实施强迫性义务教育。对于从事精英教育的文科中学和大学，国家主要通过向毕业生提供在政府和军队就职的前途，借此把这类学校纳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轨道。

关于后者，尼采感触尤深。在他看来，文科中学数量激增，其培养目标却日渐功利化，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国家政策引导的结果，为此“国家不必做更多的事，只须把政府的所有高级职位和绝大部分低级职位，大学的授课资格，尤其是影响最大的军职优待，都带人与文科中学的必然联系之中”就可以了。于是，“文科中学主要被看做某种晋升之阶”，那些天赋优良的青年不由自主地被引到了从政的方向上。^②

①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三讲，本书第73页。

②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第三讲，本书第73—74页。